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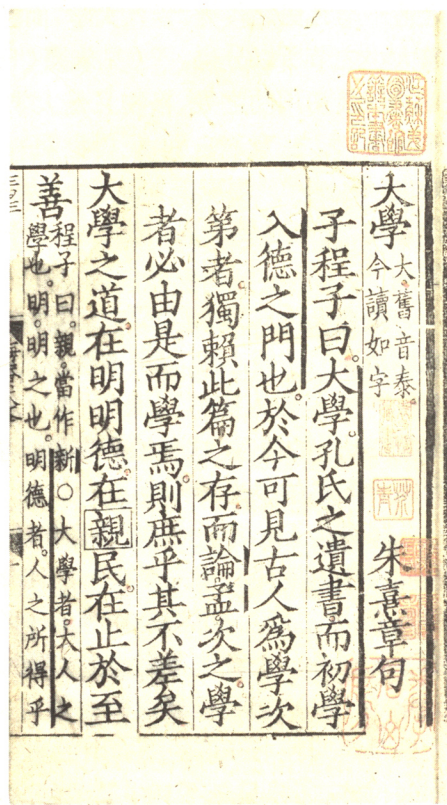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图书馆所藏标抹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考略

李致忠

2011年南京图书馆报来一部带有句读、标抹的元刻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(见图一),参与珍贵古籍评审。因其版式风貌不似元刊而类宋刻,故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人专程前往南图作进一步考察。此书每半叶七行,行十五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左右双边。版心上镌大小字数,下镌刻刊工姓或名。有句读,重点文句右旁镌刻标抹。行疏字朗,字体端庄,一派宋版书气象。

一、朱熹作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缘起

朱熹长孙朱鉴编撰的《朱文公易说》卷十八,记载有人问朱熹怎么看《周易》,朱熹答曰:“未好看,《易》自难看。”并说:“《易》本因卜筮而设,推原阴阳消长之理,吉凶悔吝之道,先儒讲解失圣人意处多,待用心力去求是,费多少时光!不如且先读《论语》等书。某枉费多年工夫,近来于《诗》、《易》略得圣人之意。今学者不如且看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四书,且就见成道理精心细求,自应有得。”同卷又载朱氏尝说:“人自有合读底书,如《大学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等书,岂可不读!读此四书,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,以其为学之次序,然后更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。某才见说看《易》,便知他错了,未尝识那为学之序。”清人程川所编的《朱子五经语类》卷二也记载了类似的说法,并引



图一

证朱熹的话说“《易》自是别是一个道理,不是教人底书。”朱熹还在自己的《晦庵集》卷八十二《书临漳所刻四子后》中说:“自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,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,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,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旨要归也哉!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,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书,然后及乎六经,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。”朱熹之所以反复强调要先读这四种书,没有什么更深奥的意思,只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更符合由浅入深、循序渐进的治经道理。

上述朱熹的这些说法,反映了他有两个读经主张:一是他认为《周易》的性质,乃卜筮之书,是用来“推原阴阳消长之理”和“吉凶悔吝之道”的高深著作,开始就读它,“未易”,“未好看”。不如先读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这四种书。原因是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既治,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”(见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读论语孟子法》)。表明他认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反映了《六经》的精神要旨,若真能读懂读通,则《六经》可不治而自明。这显然是要为士子们指出一条读经的门径。二是朱熹认为《大学》,乃孔氏之遗书,是“初学入德之门也”。又说:“古之《大学》,所以教人之法也。……人生八岁,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,皆入小学,而教之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;及其十有五年,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,以至于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,皆入大学,而教之穷理正心、修己治人之道。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。”(见朱熹《四书章句·大学章句序说》)又说“《大学》是圣门最初用功之处,格物又是大学最初用功之处。试考其说,就日用间如此作功夫,久之,意思自别,见得世间一切利欲好乐皆不足以动心,便是小小见效处也。”(朱熹《晦庵集》卷五十八《答宋深之》)足见朱熹之所以要为《大学》作章句,完全是要为人们提供一个“初学入德之门”,以及循序渐进的读经方法。

朱熹又说: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。中者天下之正道,庸者天下之定理。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。”(见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序说》)所以他说《易》“不是教人底书”,而《大学》才是“初学入德之门”,《中庸》才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的捷径。这恐怕是朱熹以毕生精力关注《四书》的主要原因。这是教育家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。

朱熹为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作集注,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章句,并不是完成在同一个时间段。南宋孝宗淳熙四年(1177)朱熹完成了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集注;十二年后,也就是在淳熙十六年(1189)才又完成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章句任务。史载他在完成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章句的第二年,即南宋光宗绍熙元年(1190),就到福建漳州去做官,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就在当地付梓了,这大概是这四种书开雕的第一个版本。只可惜这个版本久已失传,究竟是四种书同时付梓,还是只刻了其中某两种,今已无法言其状况。不过从现存最早的宋版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看,漳州本大概仍然应该是四种书各自起讫的单行状态。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现存最早的刻本,是宋嘉定十年(1217)吴柔胜当塗郡斋刻嘉熙四年(1240)淳祐八年(1248)十二年(1252)递修的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,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;淳祐十二年(1252)金华马光祖当塗郡斋刻的《大学章句》、《中庸章句》各一卷。这四种书今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《大学章句》后镌有淳祐十二年(1252)壬子金华马光祖的刻书跋,称:“当塗旧有文公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,注与本文皆大字,于老眼为宜,盖正肃吴公所刊,见谓善本。”又称:“光祖应竭来攸守,依仿规制,取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章句并刊之,足成《四书》。《语》、《孟》岁月浸久,间有漫灭,就加整治。是书在天地间无穷达,老少皆不可一日废。熟读玩味,则施之行事,其有不敬且畏哉!淳祐壬子孟秋朔日,金华马光祖敬识。”表明此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之刻是在两个不同时段里先后完成的。第一个时段,是嘉定十年吴柔胜官太平州时,首先将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序说》一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《序说》一卷刻于当塗郡斋。第二个时段,是三十五年后的淳祐十二年(1252),金华马光祖来守太平州时,又依仿当年吴柔胜刻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时的版式规制,刻了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。与此同时,马氏还取用吴刻《语》、《孟》集注旧版加以修补整治,与新刻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同时印刷,足将四书归于一体,故其版式字体、印纸墨色浑然天成,若是不知道上述刻版修补经过,实难加以区分。

二、何为标抹

朱氏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问世之后,影响日深,版本迭出。为了进一步指导阅读,有人又对《四书》中重点文句加以特殊标识,于是出现了粗黑的墨线“标抹”,用以指示读到此处当特别留心注意,反复体会,以理解其深奥圣意。反映在雕版印书上,则是指在书写版样时于重点文句旁要以粗黑墨线加以标识,而版样上版刻梓过程中对这种标抹线同样加以刊雕保留,故印出书叶后某些文句右旁即呈现出一些长短不同的粗黑墨线,古人将这种标识性的粗黑墨线即称为“标抹”或“旁抹”。

标抹现象的出现,盖始于南宋中后期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五著录《古文关键》二卷,谓:“吕祖谦所取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诸家文,注释标抹,以教初学。”这大概是有关“标抹”一词的最早记录。吕祖谦编选《古文关键》的缘起及成书经过,史未明书,无以探其究竟。不过他中进士在南宋孝宗隆兴元年(1163),而他英年辞世在淳熙八年(1181),这中间不过十八年。而在这十八年中,他于淳熙四年(1177)至淳熙六年(1179)承诏辑选了一百五十卷的《皇朝文鉴》,并因此积劳成疾。有辑选《皇朝文鉴》的先期成果,又养病有暇,此时编选《古文关键》亦未可知。《宋史》本传说他“既卧病,而任重道远之意不衰”。也透露了一点他此时选编《古文关键》的可能性。而这段时间的期限,不过是从淳熙六年的正月,至淳熙八年两年多一点的时间。因为淳熙六年正月,

《皇朝文鉴》才最终进呈,了断了一桩承诏辑撰之事,也才有暇选编《古文关键》。

《古文关键》是一部范文选集,选录韩愈、柳宗元、欧阳修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张耒等人之文凡六十余篇。并“各标举其命意、布局之处,示学者以门径,故谓之《关键》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七《古文关键》提要)。今检此书,总论中首先提出的是《看文字法》,其下指出“第一看大概主张;第二看文势规模;第三看纲目关键;第四看警策句法”。接下去是“看韩文法;看柳文法;看欧文法;看苏文法;看诸家文法”。再往下是“论作文法;论文字病”(出处同上)。分明是遴选范文,加以指点评论,从而指导人们读文、品文、作文,是典型的文论、文评性质的作品,所以《宋史·艺文志》将其类归在文史类的诗文评中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录《古文关键》时用的是明嘉靖刻本,已无标抹墨线,所以四库馆臣说:“考陈振孙谓其‘标抹注释,以教初学’,则原本实有标抹,此本盖刊板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,不似今人之圈点,以为无用而删之矣。”可知到明嘉靖时,刻书家或已不懂宋人标抹的含义,镌版时有意将其删削;或嫌行线细而标抹粗会增加镌刻难度,费工耗时,增加刻书成本,故有意将其删削。总的是明代以后,这种带有标抹的书刻就不再流行了。《古文关键》开刻书带标抹之先河,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这类脍炙人口的经学著述则紧随其后,刻时镌印标抹、句读,南京图书馆申报评审珍贵古籍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就带有这样的标抹、句读,且版式规制、字体风貌、印纸墨色等极类南宋刻书的风格,因而产生了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刻本的疑问。

三、前人的鉴定意见

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卷十七,有《四书集注》跋文两篇,其一曰:“右《四书集注》,其句读、旁抹之法,兼取勉斋黄氏、北山何氏、鲁斋王氏、导江张氏诸本之长,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,加以音考,盖今最善本也。刻板在常州府学。此集六册,永乐十年二月余奉命考会试,常州府学教授金原祺时预同考,余从求而得之者也。其刊刻亦间有错误。”其二曰:“右《四书集注》三册,刻板在鄞,句读一用黄勉斋法。又有熊勿斋标题,便于学者,盖善本也。”

两跋中第一篇所描述的《四书集注》,似与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版本有关。跋中所说他当时见到的此书,其句读、旁抹的方法,是兼取勉斋黄氏、北山何氏、鲁斋王氏、导江张氏诸本之长。而被取法的黄氏指黄榦,南宋人,是朱熹的女婿和嫡传弟子;何氏指何基,南宋金华人,受业于黄榦,是朱熹的再传弟子;王氏指王柏,南宋金华人,是何基的门人,是朱熹的三传弟子;张氏指张栻字达善,宋末元初四川人,师从王柏,是朱熹的四传弟子。足见句读、标抹之法在南宋确实比较流行,否则就不足以为后世所师法了。

跋中还有“宣城张师曾为之参校,加以音考”之语,很重要。张师曾字叔舆,张师愚之弟,元代后至元中曾编撰过《梅尧臣年谱》,延祐、天历中尝领乡

荐。这样一个人若参与了《四书集注》的校勘并撰有《音考》，则是书之刻，通常怎么也不会再是宋刻了。且刻工头人是平江章有常，平江就是苏州，离常州仅为咫尺之地，领人到常州府学佣工开雕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是很容易理解的情节。且此书的字体风格，亦是宋时江苏地区刻书的风貌。所以若定此书为“元常州府学刻本”，理论上、文献上、逻辑上都是十分顺畅的。且据瞿冕良所编《中国古籍版刻辞典》记载：“章有常，元天历间平江人，刻字工人。参加刻过《中庸章句》（常州府学本，半叶七行，行十五字）。”则此书之刻在有元一代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结论。

此书进入南京图书馆前身即江南图书馆之前，乃丁氏八千卷楼旧藏，故此书卷前有丁丙跋文，云：“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、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、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、《孟子集注》十四卷。元刊宋本。袁又恺藏书。”后边则续引上述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跋文，并说：“此则句读、旁抹、音考一一吻合；《中庸》末有‘平江章有常刊’六字，其为常州版所出无疑矣。”可证丁氏所题“元刊宋本”之意，是说此本为元代据宋本所翻刊。

然而，此本莫友芝似乎也见过，并且留下了鉴定意见。莫氏意见记录在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经部四书类，云：“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孟子集注》七卷《中庸章句》一卷……。钱塘丁丙收一本，亦七行十五字者。经注句读有旁抹及方圆围，其文字异今本处，与吴志忠所言宋本大同。序后及每卷末皆附《音考》，于名物制度亦有补益，盖宋元翻刻所加，当在用以取士后也。其《音考》字较本书圆活。同治丁卯秋，客杭州见之。”

这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处：第一处是说序及每卷后的《音考》“盖为宋元翻刻所加，当在用以取士后也”。众所周知，元代恢复科举取士制度，在元仁宗皇庆三年（1314）八月以后。皇庆二年（1313）十月，中书省再次提出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申奏，并建议“专立德行明经科，以此取士，庶可得人”。十一月仁宗下诏：“其以皇庆三年八月，天下郡县举其贤者能者，充赋有司。次年二月，会试京师，中选者，朕将亲策焉。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。”（明陈邦瞻《元史纪事本末》卷八）元朝恢复科举考试之后，才决定从《四书》中出题，并取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为阐释依据，于是朱氏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复加盛行。莫氏说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序和每卷之后的《音考》，“当在用以取士之后”，指的就是元仁宗恢复科举取士之后，所以他说《音考》盖在宋元翻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才加上去的。第二处是他说“《音考》字较本书圆活”，也就是说他认为《音考》字体与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正文字体不同，《音考》字体比正文字体圆润柔和。这大概也是莫氏认为《音考》是后加上去的原因所在。

傅增湘得见此本，是在今南京图书馆的前身——江南图书馆，这次再见时审定的意见，著录在他的《藏园群属经眼录》卷二。中华书局2009年版《藏园群属经眼录》卷二经部四书类题解云：“《四书集注》二十八卷，宋朱熹撰。宋刊本。半叶七行，行十五字，注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栏。版心上记字数（大小分

记),下记刊工姓、名。铃有‘项氏少溪主人子信□周所藏’(白)、“万卷堂印”(朱)各印,及钱塘丁氏印、刘彦冲藏印。按此书大字精善,审其刀法,或出自豫章。江南图书馆所藏。”这里明白无误地将此书审定为“宋刻本”了,并说“大字精善”,“或出自豫章”。也就是说傅氏不仅将之鉴定为宋刻,而且认为可能出自江西。收藏单位是江南图书馆,即今南京图书馆前身。莫氏认为《音考》是宋元翻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加刻上去的,显然认为《四书》正文是宋或元时所翻刊。傅氏则毫不犹豫地将其审定为“宋刊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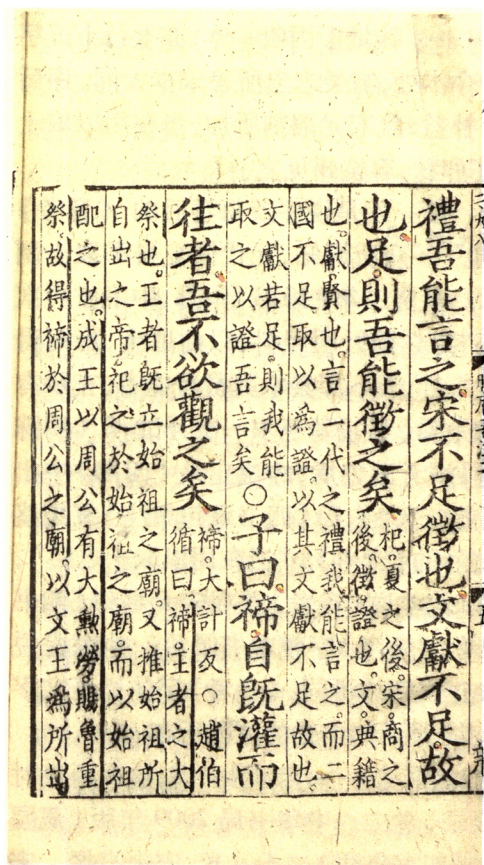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本人的推测性意见

莫友芝是晚清著名的版本大家,其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影响至深;傅增湘是清末至民国年间最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之一,一生经眼和所藏之书不啻万种,版本鉴定水平世所公认。我本人向来尊重前贤,却也从不信任何人的意见。但关此书的版本审定,我认为莫、傅所说实应深加考虑。

首先,此书的版式风貌,如版心上镌大小字数,下镌刊工姓或名,白口,左右双边,以及行款字数、印纸墨色等,确是宋版书的风格,而不是常见元版书的

风貌,或说元刻本书中还没见过有如此风格者。莫氏说《音考》“盖宋元翻刻所加”,其意是说正文大概是宋或元时所翻刊,显然是将正文与《音考》分时审定的。而傅增湘在江南图书馆见此书时,则斩钉截铁地将其审为“宋刊本”。推其原因,大概也是从此书的版式风貌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等方面入手的。我之所以认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宋刻,也是基于它的整体风貌。

其次,书中遇微、匡、恒、贞、桓、慎等字皆缺末笔(参见图二),以示避讳,这也是南宋刻书常有的现象,特别是官刻,尤其如此。当然,元时刻书,特别是元初刻书,回避宋讳者并不稀见,但同时讳避这么多字,却也并不多见。当然也可以解释说此为元翻宋版,讳字照翻,似也能通。可是翻刻毕竟不是影刻,翻刻通常只能在版式、行款字数上一遵底本,而在字体及讳字上就无法尽遵原



图二

样。元代并不是没有讳法,只是皇帝的蒙文名字汉译之后,难以全文遇到,故刻书表现出来的几无讳字。然此书若真是元代常州府学所刻,性质应属官刻,官刻之书如此肆无忌惮地回避宋朝帝讳或祖讳,似也有些可疑之处。特别是说此书刻于元文宗天历年间,那就更难理解这么多宋讳字了。元代掌握全国政权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(1271),到天历三年(1330),已定鼎六十年,再过三十八年元朝就灭亡了。天历间刻此书时,已届元朝中后期,这个时候官刻之书还如此回避宋朝帝讳,的确让人生疑。这是我怀疑此书为宋刻而不是元翻的理由之一。

再次,元吴师道《礼部集》卷十七有一篇《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》,说是“某顷年在宣城见人谈《四书集注》批点本,亟称黄勉斋,因语之曰:‘此书出吾金华子,知之乎?’其人怫然怒而不复问也。盖自东莱吕成公用工诸书,点正句读,加以标抹,后儒因之”。金华子是金履祥的雅号。金履祥字吉父,婺州兰溪(今属浙江金华)人。生于南宋理宗绍定五年(1232),卒于元成宗大德七年(1303),是宋末元初人。事同郡王柏,并从登何基之门,专治朱熹之学。有《论语集注考证》、《孟子集注考证》、《大学疏义》、《中庸标抹》等著述。宣城人谈起《四书集注》不认这位金华子,仍“亟称黄勉斋”,也就是仍然极其称颂黄勉斋黄榦,吴师道认为不对,告诉他们此书不出于黄榦,而出于金履祥,宣城人则不以为然,并且怫然而怒,不再问及此事。足见宣城人见带有句读、标抹的《四书集注》,仍然认为是宋刻黄勉斋黄榦的作品,正反映出宋刻带有句读、标抹《四书集注》的普遍性和深远影响。待到元仁宗皇庆三年恢复科举考试制度之后,由于要在《四书》中出题,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原著更是重新被重视了起来,因而寻找宋刻原版,加刻《音考》于各卷之后,确是大有可为。

再次,此本每卷后所附之《音考》,字体相互一致,而与正文字体则风格迥异(见图三)。莫友芝发现了这一现象,所以才说《音考》“盖宋元翻刻所加”,才说“其《音考》字较本书圆活”。莫氏所谓的“圆活”,其实指的就是《音考》之字结体圆润、笔势柔活。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元刻书中常见的赵字韵味。很难想象,若是《四书》正文翻刊与《音考》新刻同时进行,字体之间会有如此悬殊的差别。这种差别似乎难以让人作出别的什么解释,只能沿着莫友芝所说的思路去加以阐释。我不是一定要沿袭莫友芝的旧说,也不是拿前贤大家来为自己服务,更不是借权威之名震慑别人。我实在认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正文是宋时所刻,而张师曾所作的《音考》则是在利用旧版重印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时加刻上去的,所以才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。不仅如此,加刻《音考》时,正文旧版有馀地则接刻其上,无馀地则另开新版。而在开刻新版时,其版框大小有的与正文旧版也不同,这种现象进一步证明正文旧版开版在先,而《音考》则是元时加刻的。当然,如此说法,也许有人会拿出前引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“刻板在常州府学”之说来质问,我想解释可以有如下两点:

第一,杨士奇“刻板在常州府学”一说,可以作两种理解,一种理解是说该



图三

版雕刻在常州府学，其意则当然是常州府学刻本；一种理解是说所刻的书版收藏在常州府学，其意则当然是说常州府学藏有旧时所刻的书版。两者孰是孰非，杨士奇并未明确其说。即或就是雕刻在常州府学，他也并未申明什么时候刻在常州府学。况且常州乃五代南唐时分江阴县置军，宋则属两浙路，就称常州。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升常州为路。元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朱元璋改元常州路为常州府。所以杨士奇所说的“常州府学”，既不指宋，也不指元，因为宋当称常州州学，元当称常州路儒学，他所说的常州府学只能是明代的常州府学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则其“刻板在常州府学”，其意就当指旧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版片收藏在常州府学了。果真如此，则这套旧刻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版片就不一定是元刊，而可能是宋刻了。

第二，杨士奇“刻板在常州府学”一说给后世造成很大混乱。首先是八千卷楼主人丁丙，他据杨氏此说，提出此书为“元刊宋本”，也就是元时翻刻宋本之意。

之后是弼宋楼主人陆心源，他在《元覆宋本四书跋》中说：“《大学》一卷《中庸》一卷，题曰‘朱熹章句’；《大学或问》一卷《中庸或问》一卷，题曰‘朱氏’；《论语》十卷《孟子》七卷，题曰‘朱熹辑注’。《论语》版心或题‘晦庵吾注’，或作‘晦庵论语’；《孟子》版心间有‘晦庵注孟’、‘晦庵注孟子’等字。

《大学》版心题‘晦庵大学’；《中庸》版心题‘晦庵中庸章句’。前有《刻四书凡例》，每卷后有《音考》。每页十四行，行大字十五，小字双行，版心有字数。凡一节之义、一章之旨、一篇之凡，皆有旁抹。经中衍文，依朱子《孝经刊误》之例，于字之外加圆圜，误字加方圜，主意字眼则加上下圜、左右直之圜。注中宋人避讳改用之字则加方圜。段则以画，句则以圜。盖元时常州刊本。其圜抹之法，兼取勉斋黄氏、北山何氏、鲁斋王氏、导江张氏诸本之长。《音考》则宣城张师曾所为也。见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。”（陆心源《仪顾堂续跋》卷四，冯惠民整理，中华书局2009年版）

陆氏这篇跋文中所说的《四书》，不仅带有《大学或问》、《中庸或问》，与南京图书馆藏本不同，版心的题注也为南图藏本所绝无，显然两者决非相同版本，可是也被陆氏扯到杨士奇《东里续集》那篇跋文上，并借以审定为“元时常州刊本”，这岂不乱了套！难道常州府学既刻南图藏本的带有《音考》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又刻陆氏弼宋楼所藏既带有《或问》版心又带有不同题注的《四书集注》不成！

陆氏弼宋楼藏书于清末漂洋过海卖给了东瀛日本，此书亦随之而成了日本静嘉堂文库的插架之物。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十一月，傅增湘赴东瀛观书，在静嘉堂文库又见到了此书，并在其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二记载：“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《孟子集注》七卷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《或问》一卷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《或问》一卷，元明间刊本。七行十五字，注文双行同，版心上方记字数。每卷后有《音考》。凡篇章节之首皆加旁抹，衍文加圆围，误字加方围，其他咸加标抹。”其后又加按语称：“此书陆心源氏标为宋刊本。其刊工殊潦草，在元本中亦为下驷，断非宋刊也。”其实陆心源并未说是宋刻，而是说“元覆宋本”。傅增湘则将其审为“元明间刊本”，并说即或是元刊本，也是元本中的下驷。可知静嘉堂藏本虽然也是每版叶七行，行十五字，小字双行同，并且带有标抹，但与南京图书馆所藏之本绝非同版，两者不容混淆。

此本正文版面有断版痕迹，也有印得模糊之处，版与版之间，甚至同一版也有字体不一致的现象，而《音考》部分则无此类现象。说明正文原版有可能是常州州学在宋时所刻，而在元朝重印时随卷增刻《音考》，因而与正文形成字体不一，新旧不一。而对正文旧版则误者改，坏者修，因而也就形成同一版面而字体不一的现象。有的版面较模糊，则当是旧版重印固有的现象。

综合上述诸端记载与种种迹象，似乎可以推定此书正文是宋刻本，《音考》则是元代重印此书时所加刊，若果真如此，则此书版本似可定为“宋常州州学刻元增刊音考本”。但这只是推定，尚不是科学考证的结论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